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主编 辽海出版社

农民卷

徐浩著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EASANTS

LH
CBS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主编 辽海出版社

K249.0
/10

农民卷

徐浩著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EASANTS



LH
CB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戴逸主编;徐浩著.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12
ISBN 7-80638-382-4

I.18… II.①戴… ②徐… III.①农民运动-世界史-
18 世纪②农民运动-历史-中国-18 世纪 IV.K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678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海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16 千字 印张:14 $\frac{1}{4}$ 插页:5
印数:1—2 000 册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虹

责任校对:侯俊华

封面设计:杜凤宝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32.80 元



作者 徐 浩

作者简介

徐 浩 1961年生，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世纪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清史以及中外历史比较。著有《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合著)，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

绪 言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农 民 卷

18 世纪，那种建立在普遍联系和分工基础上的全球性和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已进入其形成的最后阶段。这么说由于亚洲此时尚能保持其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开创近代世界史的动力和领导力量不是源于曾经创造过骄人业绩的亚洲和东方，而是来自远离上古和中古文明中心的西北欧，历史的天平第一次向西方倾斜。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成功者和失败者怀着不同的心态，都在思考和试图回答这一课题。因为失败者想从中汲取教益，成功者不希望重蹈历史覆辙。

客观地说，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 100 年中，中国有 95 年处在“康乾盛世”的阶段。18 世纪的中国所取得的整体成就，不仅令她的历代封建王朝无出其右，而且也使世界为之瞠目。不过，18 世纪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迁还是微弱的；事实上，“康乾盛世”仍在重复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轨迹。18 世纪前后的亚洲，类似清帝国这样的巨大文明实体还有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德川幕府。尽管他们都曾达到过极高的文明发展水平，而且在 18 世纪以前也大多从未停

止过军事扩张，但由于其自身缺乏新的经济与社会力量，因而也谈不上有实质性的变革。可是，同一时期，在亚洲以外的欧洲、南北美洲和非洲，仍在继续着自哥伦布航海以来就已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用武力和经济力征服世界，只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演变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处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对垂暮之时的封建世界的冲击也不能例外。18世纪，亚洲凭借其传统结构积聚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仍能对远道而来的西方殖民者拒而不纳。然而，在资本主义所开启的近代文明进程中，亚洲融入世界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区别不过是以何种地位或角色进入这种渐次形成的世界体系而已。此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该动力最初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稍后是荷兰与英国。靠近上述地区的法国最早感应到来自这股动力的挑战，但旧制度统治下法国的应战并非积极而有力。因此，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海峡两岸的资本主义才真正连成一体。不过，这时的葡、西、荷由于资本主义关系在生产领域发展迟缓都已处于衰败之中。哥伦布航行以后，西北欧资本主义的首轮发展及其衰落喻示了历史演进的某种规律性。

18世纪，无论对亚洲还是欧洲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已经证明，处于商业资本主义和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欧洲，仅凭借其海上的军事优势，根本无法使亚洲成为他们在美洲以外的第二个殖民大陆。只有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新的生产力，才能征服亚洲，彻底改变亚洲的传统结构。应当说，商业和贸易并非新东西。至迟在古罗马时期，东西方就曾有着贸易往来，但这种被称之为传统的奢侈品贸易并未改变参加贸易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据说，11世纪

时，居住在北欧的维金人也有到过美洲的航海活动，并在那里拓殖定居达一个世纪左右，但最终还是永久地从美洲退却了。哥伦布开始的航海与贸易至18世纪已持续了200余年，充分显示了500年前维金人所不具备更无法比拟的巨大内驱力。虽然这种属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商业殖民主义可以使美洲和非洲的古老文明纷纷衰落，但却不能动摇亚洲高度发达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儒教文明。如果没有或推迟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自哥伦布远航开启的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活动，虽然不会如维金人一样悄然退却，但至少东西方的历史天平不会如此迅速地向西倾斜。商业航海活动为资本主义最终征服世界仅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但决不是惟一的条件。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创造了真正革命性的动力。历史在向人们证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例如远程奢侈品的贸易）的发展，有时并不必须以经济的进步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特别是与商业资本主义相对的产业资本主义），却离不开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大这两个轮子的共同运转。16世纪末，葡萄牙和西班牙衰落了，18世纪初荷兰也落在后面。此时只有英国后来居上，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英国的成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宣告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即产业资本主义的来临^①。

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一过程。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上，置于世界历史宏观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检讨。为此，可以将18

^① 关于以全球视角审视世界历史进程的著作，请参阅斯塔夫里西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

世纪的中国同印度、奥斯曼帝国、日本、俄国和西欧进行认真的、扎实的比较。我们的目的是想说明，18世纪东西方历史发展的“易位”，究竟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文明的兴衰升降到底受制于哪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当然，为了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我们也可以拿18世纪的中国与英国进行比较，因为谁也无法否同期英国的代表和领导了世界的变革。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笔者对中英农村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初步成果，期盼着它对理解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变化有所助益。就笔者所知，将18世纪中国与英国的农民或农村进行比较，这在国内外似还没有先例。对英国而言，这种比较大都截止在16世纪左右。因为一般认为，通过16世纪的农业革命、圈地运动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传统农村已得到根本改造，小农被全部剥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取得彻底的胜利。在历史研究中，18世纪英国的农村史也往往受到冷遇或忽视。除了在农业史或经济史的专门性著作中会有比较详实的论述外，在一般的历史学著作中，18世纪的英国历史大都只涉及诸如忙于欧洲战事，以股份公司进行殖民扩张掠夺，以及政党争斗和工业革命等内容。而此时的农村要么仅作为不重要的背景，被几笔带过；要么干脆只字不提。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18世纪时英国农村变革的问题已经解决^①。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们把社会转型这样如此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对重大历史事件有一种天真的或近乎崇拜的心理，相信它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会产生立竿见

^① 国内常见的这类著作有：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和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等。

影的作用；或者把社会变迁看成一次性的过程，而不需要长期的多次的变革，甚至有时会经历反复、曲折才能实现。毫无疑问，16世纪英国农村的变革还只是初步的、有限的，中世纪农村的许多传统延续下来，直到18世纪仍然根深蒂固。变革依然是18世纪英国农村紧迫的时代主题。不仅如此，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在英国还只是刚刚开始，其显著影响要19世纪末方可见到。因而18世纪英国的经济仍主要是农村经济，城市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劳动者中农民占绝对优势，农村仍然构成这个岛国地理面貌的主色调。尽管人们可以说，此时英国的财富相当大的比例来自殖民掠夺贸易，但比英国更早经营此类贸易而获得巨额财富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却并未因此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事实上，17世纪时，荷兰、英国取代葡、西，主要是由于其国内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对英国而言，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构成了这种经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直到18世纪都是如此。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农村不仅具有可比性，而且同16世纪相比，这种比较似更具有价值和意义。

行文至此，有一个问题须要稍作说明，即本卷题为“农民卷”，这是否意味着全部内容都要寸步不离地涉及农民呢？全面地再现一个时期农民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一项极有益的工作。但问题是，我们要说明为什么尽管18世纪的中国封建文明已经发展到极高水平，达到几乎烂熟的程度，但在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却步履维艰？而英国在17世纪末完成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晚期又启动了工业革命，在这不同的历史经历中，两国的农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显然，它仅从农民本身并不能获得圆满的解答。因为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小农只是半个社会，对他们的研究还须结合当时的地

主经济、城市经济、国家政权和商业贸易等方面，综合加以分析，否则既不能说明 18 世纪中国的农村社会问题，更无法对同期中英两国农村变迁的差异做出解释。因此，本卷除重点比较了 18 世纪中英两国农民各个阶层的状况，宏观的农村经济、微观的农民家庭经济 and 农民斗争实践外，还以相当多的篇幅，阐述了两国地主阶级在生存方式、阶级属性和历史作用上的差异，以及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各自特点及其影响等问题。

18 世纪，中英两国农业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走向集约化。这 100 年间，中国和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增长都在一倍上下，客观上要求增加农业生产。明朝盛世时中国有耕地近 8 亿亩，但当时人口仅 1.5 亿。如果农业生产技术保持不变，那么养活约 3 亿人口，则需要 16 亿亩耕地。实际上，至乾隆末年，中国耕地面积只达到约 10.5 亿亩，是必要土地需要量的约 66%。很显然，要养活这么多新增加的人口，除了内地和边疆开发以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原有土地的产量。18 世纪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艺学的进步所致，包括深耕、早播、选种、施肥、人工灌溉、推广复种、水稻北移和高产作物推广等技术，都取得显著进步。同期的英国，人口增长不到一倍，但土地面积在 17 世纪末已达 2 900 万英亩，至 18 世纪非但没有增加，甚至还下降了。18 世纪上半叶，英国仍能大量出口粮食，这主要由于新轮作制的实行和农艺学的进步。取消休耕地，使耕地面积可净增 1/3，但这种变化极为缓慢。仅从农艺学进步角度看，18 世纪的中国似更先进，并有效地应付了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要。但中国的农业并无活力和生气，表现在它不能为工业化创造有力的物质前提，对资本主义农业的

发展也缺少刺激力。这些英国的农村做到了。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尽管中英两国农具和纺织工具在18世纪都无根本性改进，但在动力方面，英国大约比中国更多地依靠自然力和畜力，从而提高了劳动效率。其二，虽然18世纪中英同为农业国，但两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却极不相同。中国长期以来种植业占绝对优势，形成较为单一化的产业结构。至18世纪农村产业结构虽有变化，但无论经济作物还是农村纺织业的发展都有很大局限性。英国农村大致是混合型的产业结构。除粮食生产外，畜牧业的大力扩张可以使乡村工业就地得到充足、优质、廉价的原料，从而在农村造就了近代早期至大工业形成之前的民族工业。最后，18世纪中国和英国粮食的单位面积产出量都增加了，但人均产出量的变化并不相同。大致说，中国的粮食单产和年人均产量并未同步增长，后者的增长落后于前者，因而造成粮食劳动生产率的衰滞。农村乃至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提高粮食劳动生产率，即一个农民每年的粮食产出能够养活越来越多的非农业人口。实际上，与明朝盛世比，18世纪江南水稻单产增加并不十分显著，粮食劳动生产率随着集约化反而下降。相反，英国的粮作单产及其劳动生产率都提高很快。

18世纪，两国绝大多数土地都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的生存方式和阶级属性与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方向密切相关。中国的缙绅和绅衿地主无论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来说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通过学校和科举制度等多种途径获得各项政治和经济特权，是封建国家的阶级基础。庶民地主没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大都是“力农发家”，同时也兼营其他行业，蕴含着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但从整体经济实力看，他们还不能对缙绅和绅衿地主构成挑战。英国地主包

括贵族和乡绅。经过战争和价格革命的消耗，旧的封建贵族已经消耗殆尽，都铎王朝的统治者本身就是新贵族，他们通过没收和拍卖教会、修道院及王党的土地，使许多乡绅和工商业界人士获得土地，进一步加强了新贵族的力量。到18世纪，英国的地主早已经资产阶级化了。阶级属性的不同，导致两国土地的产权关系和经营方式朝着不同的方向演进。从表面看，变化的趋势和结果都是地产集中和产权转移，但性质却大不一样。在中国，由于获得土地者大都是缙绅和绅衿地主，因而仍未脱离陈旧的封建轨迹。这类地产运动并不触及和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只是将封建的小土地所有权转变成大的封建地主所有权。英国近代土地集中，主要是18世纪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实行圈地的结果。通过圈地，过去分散的、模糊的封建土地所有权，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权，小生产让位于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大农业体制。通过地产运动和产权关系的变化，英国建立起地主—农业资本家—农业雇工这样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关系。中国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变缓慢，有两点原因很关键：一是缙绅和绅衿地主的产生和发展都仰赖于封建王朝。他们成为地主后，大都小块出租土地，地租除买地外也绝少再返还于生产领域，因而割断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任何可能。二是无论经营地主直接雇工经营，还是佃富农雇工生产，都有一个经济上是否划算的问题，而这从根本上说来是受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小农因人口压力之下投入单位土地的劳力过多，致使劳动的边际效益降低，劳动生产率下降；经营地主和佃富农虽有充足的土地，雇工劳动的生产率也高于小农，但技术和动力等条件又使雇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限制，以致新增加的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与雇工工资相比，并不占有明显优势，从而影响

了经营地主和佃富农向资产阶级的转变。

18世纪，中国农村商品经济注入了新的发展因素，包括专业性手工业和贸易市镇的繁荣，和以此为契机的全国性粮食市场的初步形成，这是此前所不曾有过的突出现象。不过也应看到，这种新变化仍具有明显局限性。因为真正进入长途贸易的粮食和纺织品数量不大，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和纺织等工业品之间的交换市场远未形成。类似松江和江南这样的手工业集中生产区也仅独此一处，其他地方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在商品经济下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即使在江南这样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极高的地区，纺织业中纺与织两个环节也未分离，封建的小生产依旧自行运转。对资本主义发展来说，地方小市场的作用有限，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出现前，它们主要服务于本地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弹性极小，不能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18世纪，英国的国内市场处在形成的最后阶段，具有80余万人口的伦敦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除为伦敦市场提供农副产品外，农村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使粮产区、畜牧区和呢绒工业区的产品，都须要相互调剂，地区之间的交换因之普遍化。18世纪英国内河航运体系的建立，是国内市场形成的标志。同时，海外贸易也迅速发展，为农村粮食和纺织品提供了空前广阔的销售市场。这种发展是同期的中国不曾达到的，也是无法比拟的。

近代或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换经济，它要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18世纪，有两个因素造成中英两国商品生产在发展上存在差异。一是中国有土地和资金发展商品生产的缙绅和绅衿地主，大都游离于市场关系之外，官本位和儒学所代表的封建价值观，阻碍了他们涉

足商品生产领域。庶民地主和佃富农虽然可以进行商品生产，但也困难重重。英国的贵族和乡绅则具有浓厚的商品化意识。为此，他们圈地、为农场进行固定资产的配套建设，并会同农场主在农业改良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他们完全汇入到农业商品化的大潮之中。其次，18世纪中国虽然出现了新兴的手工业和贸易市镇，但并未使传统的城乡关系出现大变革。在所谓的郡县城市中，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以官僚和军队为销售对象，后者以地租和国库收入进行支付，并不能大量流向农村，因而城市手工业品和农村的农副产品没能广泛和直接的交换。英国则不然，18世纪时，城市行会解体了。城市手工业主要生产大众所需的物品，市场主要在广大农村和国外。同时城市工业的兴起又需要大量农副产品。所以城乡间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为商品生产创造了广阔空间。可见，中国缺乏商品生产的主体，农村没有多样化的经济结构，新型的城乡关系还仅局限在少数新兴工商业城市或市镇之中，这一切致使它的商品经济缺乏应有的近代性内容。

18世纪，中国农民也经历了划时代的变化。一是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得到改善，封建依附关系迅速松解，租佃形态和地租形态也都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超过明代。二是农民通过“力农”、“勤于稼穡”或兼营副业，迈出了阶级分化的步伐，经营地主和佃富农已不再是个别现象。两者的出现可上溯到明代，但较快发展还是18世纪。此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一行列中。应该说，这一过程同英国16世纪以来的情形非常相似。英国的小乡绅不少人热心于农业改良，相当于中国的经营地主。他们也多来自农民上层和工商业界，大租地农更无疑出自农民

的上层。这些人与封建地主和传统农民的最大不同就是进行商品生产。当然，小农的阶级分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至18世纪末英国也未全部完成，19世纪时小农场仍占有一定的比例。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小农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为何如此艰难漫长？事物的发展总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必须承认，18世纪时，中英两国小农向农业资本家转变的数量和程度还有很大差距。英国小农分化的总体水平已越过质变所要求的临界点，可以说完成了质变的过程；而中国农村的量变还远远不够。中英小农阶级分化不在于起点的早晚，主要是速度有快有慢，水平有高有低，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有适宜与不适宜的区别。中国明代比都铎王朝建立得还要早，中国经营地主和佃富农的出现时间并不比英国迟。但至18世纪末，两国却有如此大的差距。小农只是半个社会，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解释小农分化速度和水平的差异。小农分化的快慢自然同商品生产、经营规模、技术条件、粮食劳动生产率、农业产业结构、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继承制度等关系甚密，但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经济形势、地主对商品化的反应、城乡经济关系、国内和国际市场等社会宏观环境。在这些条件都非常有利时，小农的阶级分化就会加速运动；否则，这个过程不仅迟缓，而且还具有后退倾向。

应该说，小农的阶级分化导致多数人减少或失去土地，这种半无产化或无产化并不等于贫困化，至少从长远看是如此。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扩大，资源的有效配置，技术的改善，最终都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也会从中获益，从而使生活质量逐渐改善。相反，在传统体制下，由于生产条件的严重不均、技术落后和生产效益低

下，小农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贫困落后倒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每个王朝末年都要爆发推翻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但这种阶级斗争的根源不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的的确确的求生存的经济斗争，是封建剥削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激化的表现。由于没有更加进步的生产力和先进的阶级力量，农民不能制定推进社会真正进步的斗争纲领，没有变革封建制度的斗争目标，因而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是近代化的推动力量。与之相比，英国自中世纪以来农民的分化，富裕农民与新贵族的联盟，使他们的斗争能够为新制度和新社会而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前工业时期的中英两国，农民反抗的原因、目标和历史作用也都有各自的特点，斗争的性质也因之不大相同。

目 录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农 民 卷

绪 言	(1)
第一章 18 世纪中英农民与农村经济的比较	(1)
第一节 农业人口比例与农民主要阶层	(2)
一 农业人口数量的估计	(2)
二 自耕农	(8)
三 佃农	(16)
四 农村雇工	(21)
第二节 农业生产条件	(26)
一 耕地面积	(26)
二 农田水利	(31)
第三节 农业生产力	(35)
一 生产技术	(35)
二 农村经济的多样化	(46)
三 粮食生产	(61)
第二章 18 世纪中英农村生产关系的比较	(80)